

神话的颠覆与时代的共鸣

——“小西天电影讲坛”《哪吒之魔童闹海》学术沙龙综述

■文/孙毓曦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与研究生教部联合主办的学术活动——“小西天电影讲坛”第六十一讲日前举行。此次讲坛以《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现象与启示为主题,由王小鲁、王霞、虞晓、左衡四位电影学者担任主讲人,从社会学、心理学、类型创作、文化批评等多个角度出发,对该片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提出了电影中关于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全球化的多重主题,并对电影的商业成功与文化价值进行了反思。



一、共情机制与集体心理：引发观众共鸣

四位学者一致认为《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注入现实感和构建共情机制,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电影通过人情和人性的描绘,构建了一个观众熟悉的世界,这种现实感使得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与影片中的角色实现了共情。

虞晓表示,《哪吒之魔童闹海》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它将现实的人情和人性注入神话故事中,让观众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共情。电影中的人物关系、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结构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例如“考公”情节、科层化现象、成功学价值观等,都让观众感到亲切和熟悉。

他进一步解释,影片通过群像戏塑造了多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仙界、妖界还是人间的群体,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塑造不仅依赖于主创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还体现了对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例如,哪吒与家庭的关系展现了他对家庭关系和爱的渴望,这种渴望越强烈,他对爱的抗拒就越明显。这种情感在影片中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得以表达,如哪吒在去玉虚宫考试时拒绝母亲的拥吻,以及在玉虚宫选择用敖丙的形象见哥哥,影片中加入了日常生活的情感,使观众能够理解并接受哪吒的内心世界。

虞晓还探讨了观众为何会对电影中的角色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他以为,影片中的一个关键场景,即八爪

鱼在鼎中自食其爪并与其他生物分享这一幕,既诡异又残忍,同时又充满真诚和蕴藉。这种场景不仅让观众感到震撼和毛骨悚然,更是通过吸引力的原则,让观众记住了这些鲜活的角色。他进一步分析了仙界与妖界角色的对比,仙界的角色如鹿童和鹤童虽然完美无瑕,但缺乏人性的真实感。相比之下,妖界和底层的角色,如土拨鼠和石矶娘娘,尽管有缺陷和欲望,却显得更加鲜活和生动。这些角色不仅带给观众感官上的冲击,更是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痛,因为这些生命尽管不完美,但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相似,具有同样的欲望和缺点。正是这种对人性欲望的真实描绘,使得影片中的角色死亡或被消灭不再是无关痛痒的事件,而是引发了观众的同类伤感。

王小鲁接着从共情机制和文化符号的角度展开讨论。他认为,《哪吒之魔童闹海》引发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大规模的共情现象,共情机制的建立主要依赖于文本的依据和流行文化元素两个方面。影片的共情机制不仅依赖于其叙事和文本,还得益于动画技术的进步和流行文化元素的融入。片中充满了类似周星驰电影和抖音文化的趣味性,这些元素在影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影片中的烤鱿鱼情节与《武状元苏乞儿》中的狗饭情节相似,体现了喜剧包装下的悲剧。他还提到了中国动画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天元鼎中的2亿角色场景,不仅展示了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这种大规模的场景在中国电影史上屡见不鲜,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常见的巨大规模,这些都是中国观众容

易共情的元素。

这种对人情和人性的深刻表达,是《哪吒之魔童闹海》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通过构建一个观众能够辨识和体认的世界,实现了与观众的共情,从而构成了影片成功的基石。

二、神话改写与文化根性：反抗的多层次性

王霞在讨论中对《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文化改写和反抗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阐明了影片在中国神话宇宙中的创新及其对反抗精神的重新定义。她认为,《哪吒之魔童闹海》对传统神话进行了改写,将天选之人的叙事模式进行了颠覆,并融入了个体自由意志对必然命运的挑战,体现了中国人“人定胜天”的文化根性。这种改写使得哪吒这个人物更具现代意义,也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例如,哪吒的魔丸设定,原本代表着命运的不可抗拒,但在电影中被转化为个体自由意志的象征,体现了人类对命运的挑战和对自由的渴望。

她还提到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警惕,灵珠化生是中国神话中的独特元素,与西方神话不同,但《哪吒之魔童闹海》对这一元素进行了重大改写。她将这种改写与《西游记》和《红楼梦》中的灵珠化生进行了对比,指出前者具有宗教背景,叛逆行为在森严的儒家秩序下得以化解;而《封神演义》则不同,它是从佛入道的小说,强调天道秩序的残酷和无情。她表示,《封神演义》中的天道秩序并不承认不可撼动的先验秩序,而是认为天道与人心相通,可以通过因果和人定胜天的文化根性进行商榷。

王霞进一步分析了《哪吒之魔童闹海》对天选之人的叙事进行的改写。她认为,哪吒的设定原本是一个天选之人的叙事,但影片通过加入魔丸的设定,质疑了天选之人的天生正义感。这种改写直接引发了个体自由意志对必然命运的挑战,提升了哪吒的抗争精神到存在主义的层面。她认为,这种改写使得哪吒的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含义,包含了对命运和偏见的双重焦虑。命运的焦虑表现为时间上的紧张感,即哪吒只有三年的寿命;而偏见的焦虑则表现为空间上的进步式成长,即哪吒在社会中的被排斥和自我认知的过程。

三、类型杂糅与叙事创新：突破传统框架

在学术沙龙上,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影片的类型杂糅、叙事结构以及情感驱动力,揭示了影片如何通过突破传统框架,实现了叙事的创新。

首先,《哪吒之魔童闹海》并不是单一的类型片,而是多个类型杂糅的产物。虞晓使用《教猫咪》的系统来分析影片的叙事结构,认为《哪吒之魔童闹海》结合了两个主要类型:如愿以偿和反制度化。他解释说,《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前半部分是一个典型的魔法故事,哪吒通过太乙真人的帮助实现自己的愿望,太乙真人提供的“魔法”让哪吒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需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影片的后半部分则引入了一个反向的魔法,即天尊施加的穿心咒,这个咒语要求哪吒牺牲自己以救出父母。这两个魔法故事共同构成了哪吒的叙事核心,强调了“成为你自己”的主题。

此外,虞晓表示,《哪吒之魔童闹海》还嵌入了反制度化的类型,这种类型常见于枪战和动作片中,讲述了一个人与其集体或团队之间的抗争和博弈。他提到,哪吒、申公豹和敖丙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他们在面对规则和

体系的冲突时选择了反叛。他认为,这种反制度化的叙事模式使得影片具有了更广泛的吸引力。

王霞在讨论中从人物成长、父子关系和师徒关系等角度对《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叙事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哪吒1》和《哪吒2》在叙事结构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哪吒1》主要讲述了哪吒从出生到遭天劫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封神演义》和1979年的动画片中可能只需几分钟,但在《哪吒1》中被演绎成了一整部电影。她认为,这部影片主要在讲述哪吒的进步式成长,通过视觉化的呈现展示了哪吒的出生和遭天劫的过程。她提到,哪吒的出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这种围观场面直接导致了偏见的产生。她引用福柯的理论,指出围观是一种先天的视觉暴力,群体对个人的围观伤害了哪吒的社会人格,使得哪吒始终没有群体的归属感。这种感知在《哪吒2》中得到了延伸,哪吒虽然与底层站在一起,但内心始终没有归属感。

她引用知名学者戴锦华的话,指出“哪吒既是宇宙的中心,又是世界的弃儿”,体现了独生子女的集中特点。她认为,哪吒的父亲李靖对他的爱是有问题的,类似于独生子女一代的父爱问题。李靖的爱表现为“我爱你,我可以为你去死,但我不陪伴你”,这种父爱在《哪吒1》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哪吒的形象实际上是**中国30年来独生子女成长中的一个内心画像。

她表示,影片中的父子关系不再是垂直的,而是横向的,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父权关系的变化。这种横向关系体现了父亲与儿子的紧密联系,而非传统的垂直权力关系。片中的三对师徒关系代表了跨阶层的流动性,提供了社会结构松动和晋升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被转化为升级打怪的“内卷”制度,就可能成为问题,类似于历史上的科举制。

四、文化符号与社会现象：言论表达的多样性

四位学者一致认为,《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现象,更是一个社会现象。影片通过文化符号的使用,反映了大众潜意识和时代精神,成功地捕捉到了当下的社会情绪和青年人的心理状态。《哪吒之魔童闹海》在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完成了迁移。影片不仅呼应青年人的迷茫和抚慰需求,还从个体的角度上升到了宏观的层面。哪吒从一个被动的个体成长为一个为天下苍生拼命的英雄,这种转变使得影片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左衡在最后的总结中,强调了影片在反映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方面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首先,影片中所体现的“中二”心态带有一种悲情色彩,意味着非理性,而这种非理性容易在观众中产生共鸣。他提到,围观是一种暴力,而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渴望被围观,这种现象在影片中也有体现。例如,当哪吒和敖丙共用一个身体时,哪吒将自我视为他者,这种自我观看的方式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

他说,影片的最终结论可能需要在未来才能出现,因为影片尚未下线,可能会出现更多不同的解读。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不同的人对影片的感受和解读各有不同。最后,他强调,影片在类型杂糅、符号使用和情感表达方面的特点,并鼓励观众通过自己的解读和叙事,进入现代学术的训练思维。这种多角度的解读不仅丰富了对影片的理解,也揭示了影片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深远意义。

『哪吒』启示录：探寻中国电影产业新航道

近日,“哪吒”启示录:探寻中国电影产业新航道”学术沙龙活动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邀请国内动画、电影产业、文化贸易、国际传播、电影文博领域专家学者,从《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出发,探索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新定位、新方向和文化出海新路径。

中国电影博物馆馆组成员、副馆长刘军致辞表示,《哪吒2》不仅以突破性的特效技术刷新行业标杆,更以中国动画艺术的本土化叙事震撼全球史。该片所取得的票房成绩不仅是单一市场的胜利,更是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化水准跃升的里程碑。而在“开门红”之后,中国电影产业能否形成持续创新集群?如何将个案突破转化为体系化发展动能?这正是本次论坛的核心问题。

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范周表示,《哪吒2》不仅以持续攀升的票房成绩印证了市场活力,更通过与20余家品牌的跨界合作,展现出IP价值开发的巨大潜力。这为行业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是IP开发需突破表层形象授权,向沉浸式体验、内容共创等深度合作拓展;二是跨界合作应注重用户圈层与品牌调性的双向赋能,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循环。中国电影正以创新姿态打破行业壁垒,在“科技+艺术”“文旅+百业”的融合中探索无限可能。这种变革不仅改写了传统影视的价值逻辑,更预示着一个以内容为核心、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圆桌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意娜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服务贸易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宣部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研究基地专家兼秘书长李嘉珊,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宇,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动漫策划专业主任葛竞,中国电影博物馆研究部(电影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电影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刘思羽,中国电影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副研究员黄婷围绕科技发展对电影产业的影响及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

李嘉珊认为,《哪吒2》的现象级成功绝非偶然,这是中国电影产业厚积薄发的经典之作。2003年开启电影产业化改革,党的十八年以来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政策红利的释放,影视动漫企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为优质内容孵化生产奠定了产业基础。文化贸易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衡量文化软实力的硬核指标,遵循国际惯例与市场法则实现的平等交易,是最具效能的文化传播手段。电影作为全球观众普遍喜爱的娱乐方式,是独特的传播媒介,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哪吒2》通过其国际交易价值的实现充分展现出这部动画电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王宇表示,《哪吒2》的传播现象印证了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独特生命力,其成功源于传统叙事与数字传播的深度融合。谈及流媒体对电影产业的冲击,王宇说,电影与流媒体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差异化共存。影院观影的沉浸式体验与流媒体的便捷各有优势,二者共同构建起“内容+体验+情感”的复合消费场景。中国电影应在加强内容原创性,避免“高票房低口碑”等虚假繁荣的同时,推动IP开发向纵深延伸,提前布局衍生品产业、拓展文旅联动消费场景。同时通过跨文化对话挖掘中国故事的全球共鸣点,助力中国电影从“产品输出”转向“价值输出”。

葛竞围绕AI技术对动画产业的影响展开论述,强调技术赋能需与人文价值深度融合。《哪吒2》的视效突破源于技术与艺术的共生,但AI工具的滥用可能导致创作同质化,需警惕“技术依赖”风险。她认为电影创作者应保持“技术清醒”,以文化深度驾驭技术创新。电影行业需建立“创意评估”机制,避免AI沦为低质内容的生产工具,要推动中国动画从“技术突围”迈向“文化引领”。

刘思羽则聚焦《哪吒2》对影院技术升级与文化传承的影响。她认为该片推动了IMAX放映技术的升级与产业生态重构。中国电影博物馆IMAX GT巨幕厅持续爆满的观影热潮印证了观众对高质量视听体验的追求,也倒逼影院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升级。谈及哪吒IP的开发,她表示哪吒形象从佛教护法神到现代魔童的演变,映射了时代价值观的变迁。中国电影博物馆在今后需充分利用馆藏藏品积极构建经典IP记忆库,通过藏品研究阐释,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历史参照,并通过展览、研学等活动激活文化记忆。

黄婷认为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通过“一手牵业界,一手牵观众”的双向联动,推动电影文化的普及与创新。她说,《哪吒2》的热映印证了“好内容与观众的双向奔赴”,而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正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纽带。她强调博物馆需以观众需求为导向,深化IP活化与跨界合作,通过“艺术+科技”的手段提升文化体验,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培育土壤,进行价值赋能。

意娜以“根深叶茂”概括中国电影的发展:文化传承筑牢根基,技术创新为产业赋能,多元业态拓展边界,国际贸易不断拓展。技术突围是产业升级的关键,从早期“五毛特效”到《哪吒2》的IMAX级视效,中国动画已实现从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同时,她提出技术进步赋予观众更多选择权,而好作品的核心始终在于传统文化根基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大家认为,《哪吒2》的成功并非终点,而是中国电影产业转型的起点。技术创新需与文化深度融合,避免陷入“技术堆砌”陷阱;国际传播应聚焦“共通情感”,以人类共同价值引发共鸣;产业发展需构建“创意、制作、传播、衍生”的完整闭环。从“大闹天宫”到“魔童闹海”,中国动画始终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衡。在数字技术浪潮下,中国电影正站在“文化自信”与“科技赋能”的交汇点,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书写属于自己的“新航道”。

(中国电影博物馆供稿)